

第七部分 专题材料选编

第一节 史料辑录

一、帝国主义控制北海

近代，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北海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因而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严密的控制。在思想文化领域，有了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加剧以及文化虚无主义等种种表现。

——控制北海海关，操纵北海港主权。按照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北海海关税务司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自1877年北海海关首任税务司由英国人李华达担任开始至1942年，北海海关税务司相继由英、美、挪、葡、俄、荷等10个国家的48名外籍人士充任，而且海关的其他高级职务也全由外国人担任。清政府历次委任的监督和交涉员虽名义上与税务司官员官阶持平，但毫无实权，形同虚设，只负责一些公文事务，而税务司却包揽了海关的一切大权，包括人事任免、货物进出口和船舶监管、旅客行李和邮递物品监管等，甚至可以擅自决定税率。因此，北海海关被称为“洋关”。外国人控制的北海海关不仅严重地侵犯了我国主权，而且使北海港在政治、经济上遭受严重损失。外国军舰和商船抵港可不受检查，外国人可以通过北海海关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情报，插手中国内政，任意划定港口范围。他们根据不平等条约中有关“海关行使港口管理权”的条文，取得了对北海港的管理大权，在北海海关中设立理船厅，专管港口业务，北海港的主权丧失殆尽。

——实行贸易歧视，进行经济掠夺。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在经济上对我国进行侵略和掠夺，首先便要冲破关税壁垒，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擅自降低或抬高税率，实行贸易歧视，以达到掠夺和控制进出口贸易的目的。清政府曾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对进出口货物一律按5%的税率征收正税，但1858年英国强逼清政府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后，英国“帮办商务”在夺取海关大权后，在北海海关实际上征收3%-4%的正税，而外国人所谓的日用生活品则一律免税。到了1886年，根据《中法天津条约》，北海海关将出口税又降为原税率的1/3，进口税则降为原税率的1/5。在如此低的税率下，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向北海大量倾销其商品，并大量廉价收购原材料。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美、法、英、德、葡、荷等驻北海的7家洋行，控制了北海商业贸易20%的市场份额。与此同时，英国控制的北海海关还规定，进口洋货只纳关口税（关税），不纳厘（地方税），而华商进出口货物既纳厘又纳税，对华商实行贸易歧视政策，更甚者，竟规定清政府税务人员不得上洋船查洋货。于是，北海港的对外贸易不仅出现了极大逆差，而且外轮走私盛行。据统计，从1887年到1891年这5年间，通过北海口岸进口的洋货估值为1605万两关平银，而出口的土货仅价值454万两关平银，贸易逆差达1151万两关平银；从1890年到1899年这10年间，西方国家通过北海口岸倾销了价值3000万两白银的洋货，而出口商品价值仅1200万两白银，这种对外贸易中的严重逆差，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西方列强控制北海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北海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开展文化侵略，精神上奴化人民。西方殖民主义者企图从精神上奴化北海人民，从心理上征服北海民心，培植为他们在北海进行殖民统治服务的势力。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发生了变化。外国侵略势力在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以传教为中心的文化侵略活动。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欧美的天主教和基督教、沙俄的东正教，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前，外国传教士已到北海开展传教活动。1867年，涠洲岛开禁，法国天主教会派神父随移民潜入岛内，开展传教工作，并于1882年兴建涠洲教堂。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列强纷纷在北海建立各种各样的教堂、福音堂、修女院等。如1881年法国建立高雷廉教区主教府、圣德修院、女修院，1886年德国建立长老会（后改称信义会），1904年英国建立安立间教会（后改称中华圣公会），等等。到北海的外国传教士中的一些人披着慈善的外衣，深入北海城乡各地，在“传教”名义的掩护下进行多方面的侵略活动。他们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霸占房屋田地，侮辱妇女，鱼肉乡里。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是在北海各地收集情报的间谍。与此同时，外国列强在北海开办了许多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学校、医院和其他文化设施。如法国办的广慈医院、育婴堂、德华学堂、私立中法学校、私立培德学校、涠洲天主堂小学等，英国办的普仁医院、麻风病院、男义学、女义学、私立贞德女校、华文中学、圣三一中学、私立华文学校、私立圣公小学等，德国办的孤儿院、清华学堂、私立信义小学等，美国办的私立建光小学等。又因经济落后，北海城乡存在大量失业人员。一些无法改变现状又贪图享乐的人，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为榜样，崇尚暴力、冒险和享受，以压迫和掠夺他人的方式获取物质享受，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恶霸、地痞和无赖，他们往往结成帮派，各霸一方，扰乱治安，欺压市民。

（摘自《中国共产党北海历史》，有改动）

二、大革命时期北海市工人运动简况

北海地处祖国南疆，位于北部湾畔，1876年，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将北海开辟为国际通商口岸。此后，法、德、美、日等帝国主义接踵而来。他们在北海设立领事馆，篡夺海关、税收、邮政、盐务主权；开洋行、设医院、建教堂、办学校，进行野蛮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封建地主、军阀官僚、洋奴买办等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当时在北海开设的洋行，先后有德商的“宝森行”，美商的“怡和行”，法商的“孖地行”等，德士古火油公司、美孚火油公司的商务机构均在北海建有油库，洋货充斥市场，居奇垄断，剥削北海人民。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北海产生了城市工人阶级。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北海人民曾多次反抗国内外的阶级压迫，但由于当时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自发性斗争都未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192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响应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东爆发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8月，罢工委员会派工人纠察队（工作组）到北海，组织工人、学生、船民等封锁港口，禁止英轮入境，禁止英籍人员进出，查获英货，对香港实行禁运封锁。当时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中

共两广区委派黄学增任中共南路特派员，带一批党的骨干随同广东陈铭枢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击溃了南路军阀邓本殷所属申葆蕃、苏廷有部，攻占合浦县城廉州。随后，第十师驻防台浦、北海。在师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李任予、黄竞云，共青团员徐瑞华等的指导下，北海的群众运动逐步兴起。同年秋，合浦和北海派出工人代表参加在高州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会议由黄学增主持，会上决定动员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和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

1926年，北海成为独立市，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先后派人到合浦、北海筹建县、市党部。但这些人未能认真开展工作，致使县、市党部有名无实。

1926年3月，在李任予、黄竞云、徐瑞华等的指导下，廉北各界人民开展“援助省港罢工周”活动，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募捐支援省港罢工，同时，协助筹建工人、学生、妇女等各种群众组织，灌输革命思想，鼓励他们参加革命活动。英籍传教士“董姑娘”（董恩典）勾结官府欺压群众激起公愤，在第十师的帮助下，北海工人、学生、市民群众强烈抗议，要求将“董姑娘”驱逐出境。当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经过英国领事馆时，英国人怯于众怒难犯，被迫答应将“董姑娘”遣返。另外，法籍的“卑路鬼”恃势打人、窝赃聚赌、强奸妇女、走私贩卖枪支和鸦片，北海人民对他恨之入骨。在驱逐“董姑娘”斗争胜利的鼓舞下，北海人民向当局和法国领事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驱逐“卑路鬼”。在一片怒涛声中，这个帝国主义分子也如丧家之犬一样滚出了中国领土。这两次反帝斗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力量。

1926年5月，中共南路组织在廉江等地抽调共产党员江刺横、李雄飞、简毅、苏其礼等人到北海，联合国民党左派重新筹建国民党北海市党部，领导北海人民开展革命活动。在市党部，江刺横任组织部部长，简毅任工人部部长，张达超（国民党左派）任妇女部部长，陈国兴（进步青年）任青年部部长。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北海是个交通方便的港口，工人比较集中，接受革命思想较快，因此，1926年6月，钦廉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北海党小组首先在北海成立，由江刺横、简毅、李雄飞、苏其礼4人组织成立，江刺横任北海党小组组长，之后发展了一批党员。中共两广区委组织部秘书潘兆璠和南路党的负责人黄学增、韩盈等曾来北海检查和指导党的工作。北海党小组建立后，积极发动工人群众成立工会，有洋务、驳艇、手车、海员、码头、建筑、五金、首饰、鞋业、茶居、理发、车缝、渔业、木器、装船等10多个行业工会，会员发展到5000多人。江刺横、李雄飞还曾到涠洲岛发动当地群众组织农会、渔业工会和青年同志社（共青团的外围组织）等。青年同志社开展过对法国神甫的斗争活动。当时南路的工人运动，以梅录、北海开展较好。

1926年10月，北海市总工会成立，负责人为江刺横，工会委员长为钟辉廉。北海市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北海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北海革命运动以工人运动为中心，推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北海市总工会成立后领导劳苦大众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对蓄婢纳妾，打倒贪官污吏，破除封建迷信，等等。此外，还组织工人纠察队、工人俱乐部和各种业余夜校，办了3期进习班，通过教学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学员的思想觉悟。北海市总工会还带领工人纠察队和学生宣传队进行大规模的反封建活动，并将今北海外沙桥附近的三婆庙作为北海市总工会办事处。每当节日和召集群众大会时，在原北海市中山公园

内的中山纪念台上，各界代表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和发表演说，场面十分热闹。游行时工人高举红旗、舞狮舞龙，锣鼓喧天，工、农、兵、学、商列成浩浩荡荡的队伍。示威游行队伍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大家团结起来，救中国”的雄壮军歌，呈现一派火热的革命景象。当时北海是广东南路工人运动规模最大、最有成绩的市（县）之一。

1926年12月初，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海市总工会发动群众，开展打倒贪官污吏陈椿熙的示威游行。陈椿熙于1926年初任北海市警察局局长，后升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相当于市长职）。他利用职权滥收捐税，贪污勒索，中饱私囊，引起很大民愤。北海市总工会在党小组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倒陈”运动，成立了北海各界打倒陈椿熙委员会，向全省发出声讨陈椿熙的“快邮代电”檄文，列出陈椿熙鱼肉人民的十大罪状。这次“倒陈”运动声势浩大。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各界群众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将陈椿熙撤职查办。示威游行群众包围了庇护陈椿熙的国民党第十一师师部，与该师的代师长邓世增进行激烈辩论。与此同时，为了声援市区的“倒陈”运动，在党的统一部署下，涠洲岛人民也举行了反对陈椿熙的示威游行。在强大的群众运动压力下，陈椿熙被迫下台。这是北海人民在北海市总工会成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国共合作以来，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这使国民党右派十分恐慌。继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又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领导权的《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右倾让步，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分子篡夺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各部的领导大权。

1927年2月，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发出“改组全省各市县党部的决定”，把一切在党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清除出去。同年3月，市党部被“改组”，在市党部任职的共产党员江刺横、简毅和国民党左派张达超、进步青年陈国兴等被解除职务，直接由国民党广东省当局任命国民党右派曾广钰、林培、李玉岗、劳达真等人为市党部“改组委员”。这一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狰狞面目，一场激烈的阶级大搏斗即将展开。北海市总工会果断采取相应措施，派人四处张贴“打倒新兴军阀”等大字标语，矛头直指第十一师师部，揭露敌人破坏革命的罪恶阴谋。以邓世增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也在密切配合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形势十分紧张。江刺横等人被解除市党部职务后，不避窘境，克服重重困难继续领导北海市总工会工作，积极联系群众坚持对敌斗争。他们与工人骨干在白屋村松林里开过几次秘密会议，准备联合一部分进步人士和争取驻军的同情与支持，定期举行武装起义攻打第十一师。举事的红布标志都已准备就绪，但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加上被坏人告密，应变部署还未完成便被敌人突然袭击。

1927年4月23日深夜至翌日凌晨，第十一师出动武装部队，突然包围北海市总工会所在地三婆庙及党的秘密联络机关肖我照相馆等处，北海党组织的领导人及北海市总工会负责人等10多人不幸被捕。北海工农闻讯纷纷请愿要求第十一师放人。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同志及工人、渔民积极设法营救，布置人员在各街头巷口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尤其是外沙的渔民，在获悉敌人准备杀害被捕同志的消息后，就事前备好船只等待暴动营救被捕同志。但狡猾的敌人却扬言大洋一

千可赎一人，借此掩人耳目，实则加紧审讯，以尽快杀害被捕同志。

伪北海市审判厅厅长江磷如与江刺横是堂兄弟，他企图以“堂兄”的宗亲关系设宴劝诱江刺横归顺国民党。江刺横视死如归，激昂陈词揭露敌人的卑鄙阴谋，将一桌酒菜踢翻，被在场监视的匪兵冲上去朝他刺了两刀，鲜血染红了他的上衣。钟辉廉在遭受敌人审讯时也是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祸国殃民的罪状。手车工会负责人潘铁汉知道自己即将被杀害时，镇定自若劝慰来探监的亲人不要伤心难过，还乐观地要亲人回去拿剃刀给他刮胡须，以便仪容整洁地步上刑场。年仅19岁的潘国鼎是独生子，他听说父母要变卖家产凑钱赎他出去，便劝阻亲人说：“不要相信敌人的鬼话，留着这笔钱给你们养老吧，原谅我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了。”其他被捕同志同样表现出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在狱中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敌人从被捕同志身上得到的只有怒骂和冷嘲，于是决定将他们杀害。



1927年，江刺横、李雄飞、冯慕周等7名革命志士英勇就义（北海日报社 供图）

1927年5月3日（农历四月初三）中午，刽子手们把7位革命者推出审判厅大门，匆匆押赴对面海滩（今北海海滨公园内）枪杀。在刑场上，江刺横、李雄飞、冯慕周、冯五其、钟辉廉、潘铁汉、潘国鼎7人高呼“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壮烈牺牲。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牺牲了，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土豪、官僚买办欺侮压迫的北海工人阶级等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持不渝地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进行坚决反抗与斗争，如1936年9月3日刺杀日本间谍中野顺三。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1938年初，北海的党组织恢复重建，领导北海人民坚持了12年的艰苦斗争，直到北海获得解放。

50多年过去了，而今缅怀英雄业绩，追忆革命先烈，他们舍生取义的英雄气节、无产阶级的崇高品质、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学习。英烈们用鲜血写下可歌可泣的光辉史册，浩气长存、永垂不朽，鼓舞着我们在新长征道路上继续前进！

（作者：北海市总工会工运史编写小组。原载《广西工运史料》第三期，有改动）

三、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北海市党部

1926年2月，广东省把北海划为独立市，随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员到北海筹建市党部。因办事不力，筹建工作稽延时日，进展不大。

1926年5月，国民党广东省南路特派员林增华（共产党员）从廉江抽调江刺横同志到北海负责重新筹建市党部。江刺横同时受中共南路组织的委派，到北海开展建党工作。中共南路组织还从廉江等地抽调了简毅、李雄飞等人与江刺横一起到北海开展建党工作，并协助江刺横筹建市党部。他们3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先后以双重身份在北海开展工作。

1926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派特派员潘兆璠来北海。在他的主持下，北海党小组成立，成员有党员江刺横、简毅、苏其礼、李雄飞等人，江刺横为小组长。

从1924年开始，国共两党便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北海党组织建立后正是利用统一战线的建立，联合国民党左派重新筹建国民党北海市党部。1926年7月11日，市党部成立，地址在升平街内（今珠海西教堂对面的水产公司宿舍），有区党部3个、区分部12个，党员2000余人。党员中以工界为最多，次为学、商、农、妇，执行委员有江刺横、黄敬初、潘国鼎、钟宝琪、简毅、廖竹洲等，监察委员有李雄飞、冯五其、谭程祥等。市党部分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商民、农民、工人7个办事部门，江刺横任组织部部长，简毅任工人部部长，张达超（国民党左派）任妇女部部长，陈国兴（进步青年）任青年部部长，苏其礼任农民部部长，负责人为江刺横。

当时的市党部，实际上是在北海党小组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机构。党组织正是通过市党部的合法地位，领导北海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市党部成立之前，北海是没有工会的，其后，各工会相继成立，计有码头、海员、驳艇、装船、手车、车缝、鞋业、店员、建筑、理发、炮竹、屠宰、洋务、茶居、首饰、木器等10多个基层工会，会员发展到5000多人。1926年10月，各工会联合组成了北海市总工会（负责人为简毅、钟辉廉等），并以工人运动为中心推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农民协会、渔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协会。当时的市党部革命气氛很浓，十分活跃。市党部内办公场所正中挂孙中山像，两边挂马克思、列宁像，墙上张贴的标语是：“打倒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市党部每星期开一次会，主持人江刺横，各区党部、区分部和各工会的负责人均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宣传革命道理，介绍革命形势，如介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分析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原因，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开展支持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斗争，等等，并和各基层领导研究当前开展的工作。市党部还印发各类革命传单和文件，分送到各基层单位和渔村、农村，甚至送到涠洲岛、斜阳岛，并创办了各种民众夜校、工人俱乐部、工人讲习班，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道理，分析革命形势，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市党部领导各行业工会与资本主义展开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工人工作，领导妇女同传统的封建势力作斗争，争取婚姻自由，反对蓄婢纳妾。市党部还派员深入广大渔村、农村和海岛，组织农会，发动岛民开展打倒土豪渔霸，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每逢节日或纪念日，市党部便组织各阶层民众举行大游行，工人队伍、商民队伍、学生队伍、农民队伍、妇女队伍……一行行、一列列，大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敲锣、打鼓，夜间则点上灯笼火把，舞狮舞龙，煞是热闹。革命气氛之高涨，在北海是空前的。

1926年的北海，封建迷信的气氛还很浓，为提倡革命新风，11月间，市党部研究决定，由市总工会出面组织全市各阶层民众开展破除封建迷信的活动。

同年12月，市党部组织和领导了“倒陈”运动。当时的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对市党部领导的民众革命运动极为不满，利用其地位常与市党部对抗，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民众对其恨之入骨。因此，在市党部领导下，由北海市总工会出面组织北海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会中通过了组织成立北海各界打倒陈椿熙委员会的决定。会后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市罢工、罢市、罢课，万人空巷，到市政筹备处示威，并包围庇护陈椿熙的第十一师师部。在北海人民强大的压力下，陈椿熙被迫下台，“倒陈”运动取得了胜利。然而，第十一师对市党部憎恨日甚，对市党部的活动处处掣肘。市党部也针锋相对，发出了“打倒新兴军阀”的口号，矛头直指第十一师，双方矛盾越来越尖锐。

1926年12月，南路农工代表及国民党代表联席会议在高州召开。在南路，工人运动以北海市和梅录市最为活跃，北海方面有江刺横等代表参加。会后，江刺横代表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参加了1926年12月26日至1927年1月3日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十分猖狂，江刺横和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部长刘尔崧等坚决主张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批判国民党右派违背孙中山遗教，反对压制和摧残工农运动。会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越来越明朗化。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发出“改组全省各市县党部的决定”。3月，国民党北海市党部被“改组”，由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直接任命反动分子曾广钰、林培、李玉岗、劳达真等人为市党部改组委员。原市党部内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均被解除职务。市党部的招牌已改成国民党北海市改组委员会。

改组后的市党部与北海驻军第十一师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共同抵制革命群众运动，制定原市党部和市总工会领导的黑名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市党部接到上峰要镇压共产党的密令，便勾结第十一师，由第十一师出动反动军队，于4月23日突然包围市总工会的所在地三婆庙及党的秘密联络机关肖我照相馆。被捕的同志有北海党小组和市总工会的负责人江刺横和李雄飞、冯慕周、冯五其、钟辉廉、潘铁汉、潘国鼎等人，基层工会的负责人顾际隆、梁维英、梁久志等多人，还有合浦一中黄大伟、郭泽真、郭泽亭、崔雪珍等一批进步学生。5月3日，在今北海海滨公园内，北海党小组和市总工会的负责人江刺横等7位革命者被枪杀，其余人被家属或学校保释出狱。

四二三事变后，市党部和第十一师继续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北海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北海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国民党右派所掌握的市党部和反动军队第十一师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1927年3月前和3月后的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党部。前者是中共北海组织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实际上，北海党组织正是通过市党部，具体地、合法地领导北海地区的革命运动，它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产物，它通过广泛地发动各阶层的人民起来革命，迅速地掀起了北海地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起到了中共组织难以起到的作用，无疑应该在北海地区的革命斗争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后者则是由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市党部，它

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充当了蒋介石反动派的鹰犬，成为镇压革命、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故它也应该在我们对敌斗争的历史上留有一个位置，好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作者：张海涛。原载《北海文史》，有改动)

四、北海贞德女子学校的反帝斗争

北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盘踞，帝国主义列强的各种建筑和设施占市区总面积的1/3。长期以来，帝国主义控制中国主权，掠夺人民财富，骄横自大，俨然以北海主人自居，动辄以军舰大炮相威胁。对于北海掀起的大革命运动，他们本能地持着敌视和破坏的态度。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大革命运动，理所当然地将那些敌视革命的帝国主义者作为革命对象，在大革命洪流的冲击下，群众也起来与他们进行斗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1925年秋北海贞德女子学校反对校监董恩典的斗争，即北海贞德女子学校的反帝斗争。

北海贞德女子学校的校监，其中国名叫董恩典，她原是英国的一名洗衣妇，对中国学生十分苛刻和傲慢，常常无缘无故地打骂和体罚学生。有一次，一个叫张德恩的女学生，只因爱唱爱跳，用筷子敲着锅炉打节拍，就被董恩典毒打后又被关在监管室里，因此该校的学生对董恩典既恨又怕。但是，当董恩典公开污蔑大革命运动，蔑视中国主权的时候，这些青年女子也勇敢地站出来与她进行斗争。



北海贞德女子学校旧址（今北海市人民医院内）（北海日报社 供图）

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继爆发，这一系列事件在北海引起了震动，市民和学生连日不断地游行示威、募捐和演讲。贞德女子学校的学生也深受感染，她们手持三角小红旗加入示威队伍中，却遭到董恩典蛮横地阻挠和反对。为了阻挠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董恩典宣布开除一批“不听话”的学生。这一决定遭到全校学生的强烈反对，全体学生举行集会，坚决要求董恩典收回这一无理的决定。董恩典却盛气凌人地赶往会场，企图驱散集会的学生。见学生不理睬她，她恼羞成怒，一把将悬着的国旗扯下扔到地上，边踩边骂学生。董恩典的行为引起在场学生的愤怒，沈卓清、张达超等立刻上前与她理论，责问她“为什么要践踏中国国旗”“为什么

要骂学生”“为什么要开除学生”，并要求董恩典当场向学生赔礼道歉，并向国旗三鞠躬。董恩典不但不认错，反而要学生滚出校门，不让她们读书。愤怒的学生立刻冲上街头，宣布全校罢课，组织游行示威，向群众揭露董恩典的逆行。贞德女子学校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全市人民的支持，其他教会学校也纷纷对她们表示支援。

为了继续与董恩典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示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不满，张达超、沈卓清、罗道成等人在热心商人的资助下，另租民房，开办超光女子小学，专门招收原贞德女子学校和社会上失学的儿童就读。在这期间，她们还多次组织游行示威，到贞德、华文等教会办的学校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董恩典”等口号。在北海人民反帝浪潮的冲击下，贞德、华文等一批教会学校停办，董恩典则灰溜溜地回国。

贞德女子学校反对董恩典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驻北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的支持和指导。第十师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李任予、黄竞云，共青团员徐瑞华等与学生沈卓清、张达超等密切接触，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她们的觉悟，动员她们参加革命，教她们唱革命歌曲，带领她们搞宣传、集会、示威游行。同时，警告教会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尊重中国主权，不得以宗教迷信侵害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对那些作恶多端的洋鬼子，第十师也顺应民意严加打击。《国民周刊》1926年第三期就登有一则消息，报道说：“前时曾有一英国人在这里（指北海）筑有洋房一所，十分华丽，门前树木空地甚多，这洋鬼子甚为混蛋，在邓本殷掌权时期贩卖人口，在楼内私设烟赌，招人入局，无恶不作。当邓本殷逃亡、革命军到了之后，董恩典依然如故，北海市民对她恨之入骨，便密禀师长。师长立即派人前往查抄，果然在校内查出女子3人，烟土甚多，于是董恩典签字，驱逐出境。”由此可见，北海的反帝运动已深入人心，北海人民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大革命运动。

（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五、万人示威大游行，“倒陈”运动取得胜利

1926年6月，反对革命、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劣迹昭著的陈椿熙被提升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对此，民愤极大。12月，中共北海地方组织领导全市工农群众开展“倒陈”运动，成立了北海市各界打倒陈椿熙委员会，发出声讨陈椿熙的“快邮代电”，公布陈椿熙鱼肉人民的十大罪状。全市罢工、罢课、罢业、罢市，各界群众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办陈椿熙。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陈椿熙被迫下台。声势浩大的“倒陈”运动取得胜利，大快人心，在北海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欺压百姓的陈椿熙上任

据史料记载，1926年1月，北海经广东省政府批准设为独立市，管理部门是市政筹备处，首席长官为专员，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市长。3月，黄祖培被任命为北海市政筹备处的首任专员。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分裂日趋公开化，国共合作面临破裂，野心家蒋介石加紧反共叛变活动，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26年3月3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打击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又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消减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数量和职位的《整理党务决议案》。国民

党广东省党部按照《整理党务决议案》的要求，发出“改组全省各市县党部的决定”，加紧对广东各地共产党人的排斥和清理。1926年6月，驻扎在北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奉命参加北伐，由第十一师接防北海。第十一师进驻北海不久，便竭力举荐陈椿熙出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因此，黄祖培上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不到3个月，就被陈椿熙替换。

陈椿熙是一个敌视革命、反对孙中山主张的旧官僚，曾经当过北海警察局局长，在任上为虎作伥，滥用职权，横征暴敛，欺压百姓，臭名昭著，为北海人民群众所不齿。陈椿熙当上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后，反对革命和贪污腐败的本质暴露无遗。他利用职权，撤销国民党左派人士张达超的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妇女部部长职务，对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和进步势力进行多方压制和打击。1926年秋，北海人民群众开展破除封建迷信活动，陈椿熙竟然下令警察局出动军警，殴打工人，拘捕工人纠察队队员。他上任前，国民党北海市党部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他上任后，不但对已经取消的苛捐杂税一概不认账，还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增加了几项新税种，加大了对北海人民群众的盘剥和勒索，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民众更加艰难，一时间民怨沸腾，人民群众对陈椿熙恨之入骨。

（二）全市各界开展“倒陈”运动

面对陈椿熙反对革命、鱼肉人民的斑斑劣迹，中共北海地方组织负责人清醒地认识到，此人已经成了北海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成了北海新军阀和腐败官僚的代表人物，不将他打倒，不但北海的革命运动难以发展，人民群众更是没有好日子过。于是，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在全市各界发动群众开展“倒陈”运动。



北海市区举行万人示威大游行，“倒陈”运动声势浩大（北海日报社 供图）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虽已研究了“倒陈”运动的部署，但仍“先礼后兵”，由北海市总工会出面与北海市政筹备处交涉，要求释放4名工人纠察队队员。经过多次交涉，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都不答应。

1926年11月18日，“倒陈”运动正式开始。这天，全市31个工农商学团体在中共北海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成立北海工农商学联合会，在大会上宣读列举陈椿熙十大罪状的檄文。檄文指出：“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背宪违法，贪污渎职。当此青天白日之下，实不容此等贪官污吏，

应由大会吁请政府撤办。”

大会通过决议，由江刺横、李雄飞、钟辉廉、冯五其、冯慕周、潘铁汉、潘国鼎主持，成立了北海各界打倒陈椿熙委员会，在全市范围内发起打倒贪官污吏陈椿熙的“倒陈”运动，并以北海工农商学联合会的名义，将陈椿熙的罪状分别电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监察院和广东省政府民政厅，呼吁“撤办陈椿熙，由北海召开市民会议，选举市政委员会，组织市政府”。

随后，北海市区举行万人示威大游行，一时间，“打倒贪官污吏陈椿熙”“人民有选举罢免权”“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响彻全城。全市街头巷尾贴满了声讨陈椿熙的布告、标语和檄文。

（三）“倒陈”运动取得胜利

面对全市人民群众的愤怒呼声，陈椿熙竟公然与全市人民为敌，不断派出军警，撕毁声讨他的布告、标语和檄文，以扰乱治安为名，胡乱拘捕群众，激起了更大的民愤。

1926年12月上旬，由北海市总工会出面号召，组织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北海市民几乎倾城出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群众擎扬标语，高呼口号，奔向北海市政筹备处，要找陈椿熙算账。游行队伍到达北海市政筹备处，指名陈椿熙出来答话。陈椿熙被吓破了胆，灰溜溜地跑到驻军第十一师师部乞求庇护。

示威游行群众得知陈椿熙躲到第十一师师部的消息，如潮水般涌向第十一师师部，将该师部围得水泄不通，高呼“打倒陈椿熙”的口号，要求第十一师交出陈椿熙。群众代表向第十一师表明，一定会将罢工、罢市、罢课“三罢”斗争进行到底，不达到打倒陈椿熙的目的决不罢休。与此同时，合浦县和涠洲岛人民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市区人民的“倒陈”运动。

迫于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陈椿熙自知难以在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的位置上混下去，不得不向广东省民政厅提出了辞呈。广东省民政厅看到陈椿熙民心尽失，于12月29日宣布撤销陈椿熙的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职务，释放被拘捕的工人纠察队队员和无辜群众，清理陈椿熙擅自增加的不合理税种；同时，委任周昌荫为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1927年4月27日，周昌荫因贪污受贿被弹劾去职。7月9日，广东省民政厅任命廖国彦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

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发动和领导北海人民取得了“倒陈”斗争的胜利，“倒陈”运动推动了大革命期间北海革命运动走向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

（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六、“北海九三事件”

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的影响下，1936年，北海发生了“北海九三事件”，也称“北海事件”“中野顺三事件”。

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华北、西南相继发生了汉奸、日侨和日军被杀或被扣事件，造成了国民党政府外交上的被动。

两广事变期间，桂系为了扩充实力对付蒋介石，邀请著名的抗日将领、原第十

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入桂，并于1936年8月18日在南宁恢复了曾在淞沪抗战中立了战功的原

第十九路军建制，由蔡廷锴任总指挥。蔡部第六十师师长翁照垣率部于9月初进入北海布防。翁照垣进驻北海后，逐一对外籍侨民和嫌疑分子进行排查，以消除不利于抗日的人和事。在排查时，英、法、德等国的嫌疑人员逐一被排除，视点最后落在日侨中野顺三身上。中野顺三早年侨居北海，其妻子是廉州人。中野顺三在北海开了一家小药房，取名为丸一药房，是香港的日本丸一药行的分店，主要经营日本制的成药，兼售玩具和其他外国产品。据北海市民反映，中野顺三有间谍嫌疑，他常以打鸟钓鱼为名，足迹遍及北海沿海及钦廉一带，秘密绘制地图和测量港口航道水深及记录潮汐等情况。北海海关一职员还反映，中野顺三一切行动听命于日本政府，“每年受日本政府津贴千元，每星期须向日本政府作一二次报告”。经过调查，翁照垣与其秘书张梅生等认定中野顺三为日本间谍，并决定采取刺杀中野顺三的行动，掀起反日浪潮，逼蒋介石抗日。这时，第十九路军总司令蔡廷锴到合浦召开军事会议，翁照垣将张梅生收集到的有关中野顺三的情报向蔡廷锴作了汇报，并提出刺杀中野顺三的计划，得到了蔡廷锴的默许。接着，翁照垣安排张梅生负责完成刺杀中野顺三这一计划。张梅生从北海驻军中挑选5人，从合浦师部挑选2人，组成便衣行动小组。刺杀中野顺三前一星期，翁照垣召见了北海商会会长，以军事对峙时期地方情况混乱，为免保护不周发生意外为由，要求商会会长劝中野顺三限期离境。中野顺三感到事情不妙，停止营业，深居简出，有离境之意。但这时便衣行动小组已摸清中野顺三的相貌特征和家居情况，准备刺杀中野顺三。9月3日傍晚，刺杀行动小组7人来到中野顺三的丸一药房，留下2人在门外把守，其余5人进入药房，谎称买药，然后径直冲入内室，刺杀了中野顺三。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北海九三事件”。



中野顺三在北海市东华街开设的丸一药房(今珠海路104号)旧址(北海市总工会 供图)

中野顺三被刺杀引起海内外轰动，在日本掀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政府立刻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向其施加压力。最终，国民党政府除向日本方面“深表歉意”外，还给予中野顺三遗属3万银圆抚恤费。轰动一时的“北海九三事件”遂告结束。

“北海九三事件”是北海军民采取的一次抗日救亡行动，也是北平（今北京）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一连串反日事件中的一环，与全国的抗日救亡形势紧密相连。“北海九三事件”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造成国民党政府外交上的困难，极大地促进了北海人民的觉醒，振奋了北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掀起了抗日反蒋、逼蒋抗日的热潮，标志着北海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北海九三事件”中的先进知识青年，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后来成为抗日战争和北海革命事业的骨干力量。

“北海九三事件”轰动全国，国内外主要报刊连续登载，毛泽东曾将“北海九三事件”和“成都事件”称为新的抗日浪潮。

（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七、北海解放初期工会支前工作简况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扫荡国民党反动派一切残余武装，向我国的西部、西南部、南部迅猛进军，追歼残敌。

12月4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八师及一二七师一部在粤桂边纵队四支队的配合下，自合浦神速进抵北海，分两路向盘踞龟缩在北海市的国民党中央军暂编第五、第六军薛岳残部，广东南路“剿共”总司令张瑞贵残部发起进攻。几番激战下来，国民党残敌望风披靡，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至当天下午1时战斗结束。除匪首张瑞贵等一部分残敌溃逃到涠洲岛及海南岛外，解放军俘敌五六千人，北海解放。

残匪张瑞贵等逃到涠洲岛后，组织建立合浦、灵山、浦北、钦州、遂溪等县伪政府，溃退到海南岛的残敌薛岳等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薛岳任防卫总司令，加速构筑工事，并配备海军、空军，建立起一道所谓“伯陵立体防线”，吹嘘“伯陵立体防线”固若金汤，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妄图凭借这道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盘踞涠洲、海南两岛的敌人遥相呼应，张瑞贵经常派特务到北海造谣惑众，诽谤解放军，离间破坏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感情，并刺探解放军军情，密报给在海南岛的薛岳。敌人企图凭借琼州海峡天险，孤注一掷，死守海南。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要进行这场规模空前的海战，我方主要是靠木船，用落后的木船、竹排与飞机、军舰作战，这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为了不让敌人有丝毫喘息机会，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根据当时的敌我形势，果断地作出决定：一定要抓住战机，趁敌人还未来得及在海南岛充分布防之际，抢在台风季节到来之前的冬春季节，迅速组织力量，及时解放海南岛。错过机会，就会陷入被动，造成革命事业的损失。遵照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英明指示，北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全面的支前工作。

（一）建立支前机构

北海解放次日，由进城大军八三部派员指导，在旧商会成立临时机构——北海人民临时办事

处，组织知名工商界人士参加，开展支前工作。12月8日，北海军政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告正式成立北海军政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加强支前工作，根据北海军政委员会及六万山支前司令部的指示，12月12日，撤销北海人民临时办事处，成立北海人民支援前线委员会，伍朝汉为主任委员，原商会理事长苏金波及林次屏为副主任委员，姚为政、李梓明等为委员。支前委员会下设粮秣、采购、总务、慰劳、民工5个组。粮秣组下设粮食、饲料、燃料3个股，民工组下设船艇、劳动、机工、建造4个股。股之下有干事、杂役等。随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根据广东南路地委书记兼支前司令部政委刘田夫关于成立相应机构加强支前工作的指示，六万山支前司令部政委陈华、司令员谭俊于1950年2月1日签署命令：结束北海人民支援前线委员会，成立北海支前司令部。伍朝汉任司令员，徐永源兼任政委，姚为政任参谋长。支前司令部下设科。军政委员会的民运科、交通科协同参加支前工作。北海支前的任务：支援大军解放涠洲岛、海南岛。主要是解决部队的粮草问题，征用船只、船工，修路架桥，了解敌情、民情等。

战后的北海，到处断墙颓垣，满目疮痍。由于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警、匪、特巧取豪夺，北海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交通运输中断，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加上敌人暗中造谣破坏，一般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还不甚了解。所以，支前任务十分繁重艰巨。为了打开支前工作局面，军政委员会及支前委员会先后于1949年12月18日、1950年1月13日召开北海各界代表座谈会。会上，谭俊、徐永源、伍朝汉等同志向各界代表宣传和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政策及各项主张，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还根据党的政策解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样一来，初步消除了各界群众的误解与顾虑，激发起他们对支前工作的热情，加上支前工作干部的努力，各项支前任务逐步得到落实。

（二）筹措粮草

筹措粮草是当时非常迫切又艰巨的任务。因为北海是个小城镇，一下子集结数万人的队伍，压力很大。俗话说：“未动兵，先动粮。”数万人马的吃饭问题成了最突出的问题。当时解决粮草的办法除了一部分由上面调拨，主要还是就地解决。一是取自敌人的粮仓，二是向市内各商店大户筹借。北海人民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和得以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喜悦心情，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大局为重，急支前之所急，倾尽了自己的力量支援前线，特别是工商界爱国人士，更是慷慨解囊。据统计，在支前时期，北海共供应部队粮食400多万斤，木柴无法统计。稻草方面，因北海不是产粮区，所以稻草甚少，先由北海东、西街人民政府及高德乡人民政府努力发动征集供应部队，不足部分由六万山支前司令部分饬党江、乾江、西场等乡镇征集调运北海备用。

（三）动员组织民工

要取得解放涠洲岛、海南岛战役的胜利，除了要依靠强大的军队，还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后勤队伍，为此北海组织了民工队。他们担负着诸如后勤运输，运送伤病员、军用物资，修路架桥，修理船只，架设电线等繁重复杂的工作。北海民工队得到了如码头工会、船员工会、海员工会、机器工会等民工团体的大力支持，全市共组织了500人的常备民工队。

为便于指挥及工作协调起见，民工队分为：

1. 陆上民工队。由码头工会负责，计有民工230多人，队长林亚福。主要负责后勤物资的陆

上运输等工作。

2. 艇工队。由海员工会驳艇组负责，有艇工约40人，队长简镜海。主要负责船上物资及人员的驳运工作。

3. 水上民工队。由海员工会起卸组负责，有民工约170人，队长顾裕忠。主要负责船上及码头上物资的起卸工作。

4. 建筑民工队。由建筑师陈兆衡任队长，有民工50人。主要担负修路架桥等方面的工作。

5. 机工队。由机器工会负责，有民工20多人，队长黄东三。主要负责修理船只，以及架设和修复电线、电话线等工作。

（四）征集船工、船只

船工、船只稀缺是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北海刚解放，沿海渔民对共产党不了解，特别是听说去打仗，他们都很害怕，有些人宁可把船交出来也不愿去开船，有的索性把船沉入海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北海军政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做了许多宣传教育工作，如到地角召集渔民开会，向他们做教育解释工作，并组织工作队到沿海的南潢、大墩海、电白寮、地角、高德、乾江、党江等地的渔村进行宣传。同时，适当提高船工的待遇，还通过北海东、西街人民政府和船员工会分别向船工做工作，共动员船工200余人，由此解决了船工稀缺的问题。至于船只的征集，主要是采取雇用的办法。起初无论船只大小，由北海至安铺往返一趟一律发给大米720斤，机帆船或汽船视其马力加发汽油或木炭等燃料。后来按船只吨位大小确定待遇，如载重量25吨以下的发给大米300斤，25吨以上50吨以下的发给大米400斤，50吨以上的发给大米606斤。

（五）开展募集、劳军活动

募集，主要是发动各界为支前募捐物品及现款。一是由工商界协同爱国人士沿家沿户劝募；二是由合浦一中的学生上街义卖小型国旗；三是在各校中发动捐献1元钱活动。

开展劳军活动：一是发动全市各界人士到普仁医院、广慈医院慰劳部队伤病员，由各中学师生代表致慰问信；二是发动各民众团体向驻地部队及粤桂边纵四支队指战员献旗致敬；三是组织粤剧义演招待解放军同志。

通过募集、劳军活动，增进了北海市民对人民军队的了解，密切了军民关系，掀起了全民支援前线解放涠洲岛、海南岛的热潮。

（六）配合解放军解放涠洲岛、海南岛

一是战前训练。海上作战不同于陆地作战。许多南征北战的战士，在陆战中生龙活虎、所向无敌，但一到海上，一经风浪就晕船，恶心、呕吐，有劲使不出。要取得解放涠洲岛、海南岛的胜利，首先要闯过熟习水性这关。所以，每天一大早，解放军就在北海沿海的岭底至地角、南湾、电白寮、白虎头、大墩海、龙潭、大冠沙一带海面开始紧张的训练，在训练中，船工们言传身教，帮助解放军熟习水性，适应海上各种恶劣气候，掌握各种航海技术，如何掌舵、扯篷、划船，如何观察气候变化，等等。在船工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参战的指战员们发扬陆战时的猛冲猛打精神，苦学苦练渡海技术，终于在较短时间内熟习水性，适应了渡海作战的需要。

二是渡海作战，解放涠洲岛、海南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部队成立了渡海作战指挥部，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任总指挥，具体领导和组织渡海战斗的各项工作。1950年2月

底至8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和粤桂边纵队二支队及琼崖纵队派遣过来的干部、战士，首先组成渡海突击先遣团。3月5日开始，先遣团在戒备森严的海南岛临高方向偷偷登陆。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一九师指战员在粤桂边纵队四支队的配合下，乘船从北海出发，于6日晨抵达涠洲岛，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激战8小时，俘匪“广东省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南路指挥所”上校参谋长甘宗正及官兵436名，伤敌人16名，涠洲岛解放。

涠洲岛的解放和临高登陆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参战部队的广大干部、战士，也激励了南路各地配合和参加渡海作战的干部和群众。

1950年4月16日，党中央发出庄严的战斗号令：强行渡海，解放海南，对敢于抗拒的反动势力坚决消灭。驻南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军、第四十三军及地方部队，在南路地区数以万计的民工、船工的有力支援下，分多路从南路各口岸到北部湾畔的各海港出发，千帆齐发，直向海南岛逼近。北海支前船工发扬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与解放军指战员并肩战斗，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和敌舰的疯狂扫射，驾着船只勇往直前，谱写了一曲曲英勇壮烈的战歌。战斗中，北海市船工丁亚保、陈德、何光合、陆亚养、吴亚九、何永江、林福祥、潘礼、张宝南、汤亚养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光荣牺牲。

5月1日，海南岛解放。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参加支前工作的人员与解放军渡海部队一道，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评功表模活动。北海市许多干部、群众被评为支前模范，有的船工被评为渡海功臣，受到部队和上级机关的表扬和奖励。凡是参加支援解放海南的工作人员，都获颁“解放海南”纪念章。

北海人民为涠洲岛、海南岛的解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人民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顾传中。原载《北海党史文集》，有改动)

第二节 人物传记

一、江刺横：钦廉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创建者

江刺横，钦廉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北海支部的负责人，北海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江刺横有救国救民之心、棘刺强横之志，他投身革命，不畏艰险，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也献给了北海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走上革命路，他更名立志

1900年，广东省廉江县良垌区南溪村的一户农民家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父亲江懋中见婴儿细皮嫩肉、印堂光亮，为他取名稚衡，希望孩子长大后继承祖业，延续家族的书香文脉。

江稚衡的祖父是清朝举人，家中建有一座藏书楼，名为桥西草堂。江稚衡自小好读书，喜欢翻看藏书楼里的书籍，立志钻研山林垦殖和公路建设专业，以科技救国。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划时代的巨变让在桥西草堂里博览群书的江稚衡抬起头来，开始关注时代风云变幻。他逐渐明白，要想救国不能光靠科技，而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现社会变革。

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江稚衡深受革命形势鼓舞，满腔热情地在家乡进行革命宣传。他组织青少年聚集在桥西草堂，学唱《农民苦》《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还画漫画、写标语，张贴在村里的墙壁上，并率领大家高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

这让乡间的地主豪绅大为恼怒，他们污蔑江稚衡“离宗叛祖”“无法无天”“大逆不道”，扬言要对他严加“管教”。江稚衡不仅对此置若罔闻，反而更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1925年春天，他说服妻子典卖家中的4亩薄田，筹足资金，离家前往革命气氛浓厚的廉江县城。

江稚衡的哥哥江公琰当时在廉江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见江稚衡兴冲冲赶来，他惊讶地问：“你来干什么？”江稚衡答：“跟你干革命！”“干革命是要杀头的！”江公琰劝江稚衡回去，但江稚衡说什么也不走。见江稚衡态度坚决，江公琰决定收留他，并推荐他当县党部的宣传干事。

在廉江，江稚衡结识了南路妇女运动先驱、共产党员钟竹筠。钟竹筠很器重他，常与他谈革命，指导他开展群众工作。江稚衡还认识了进步青年关泽恩、李雄飞等人，他们组织了廉江青年同志社和廉江县学生联合会，发动青年向城郊百姓广泛宣传革命；组建中山剧社，自编自导了许多号召妇女解放、争取人身自由、打破封建囚笼的戏剧。其中，《水上警察》一剧便影射了法官黄其祥贪污、纳妾的丑恶行径。这些戏剧取材于现实、针砭时弊，深受廉江群众欢迎。

1926年3月，廉江党组织在中共南路特派员黄学增的主持下成立，江稚衡等一批同志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至此，江稚衡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念，为表示棘刺强横的决心，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江刺横”。

在廉江党组织的领导下，江刺横组织群众开展反封建迷信、驱逐外国反动传教士的活动，与庇护反动军队的县长作斗争。江刺横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勇敢坚定，使他得到了党和群众的信任，亦受到了国民党广东省南路特派员、共产党员林增华的赏识。1926年5月，受黄学增和林增华派遣，江刺横与李雄飞前往北海，筹建中共北海地方组织和国民党北海市党部。

创建党组织，他不负重托

北海是商埠，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比较浓。长期以来，帝国主义者、封建官僚沆瀣一气，鱼肉百姓。1925年冬天，国民革命军进驻北海，开始在北海开展革命宣传和群众运动。1926年初，广东省农民协会派至北海开展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苏其礼在石子岭、垌尾村一带成立了农会。

江刺横肩负党的重托到达北海后，分析了北海的革命形势，决定深入农村、渔村、海岛宣传并组织民众，同时，着手建立中共北海地方组织。6月底，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潘兆璠在北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会议，宣布成立北海党小组，江刺横任组长。不久，党小组吸收了一批党员，扩大为中共北海市支部，江刺横任书记。经过江刺横等人的积极筹划、奔走，国民党北海市党部也于7月11日成立，江刺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该部的执行委员。

为壮大革命势力，江刺横用2个多月跑遍了北海各基层行业，发动工人群众参加革命，建立了码头、建筑、屠业等10多个基层工会组织，并于1926年10月成立北海市总工会。他与工会领导人钟辉廉发动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还创办了工人俱乐部、工人讲习班，并担任讲师。

江刺横善于开展群众运动，他把工人、学生等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发动成立了渔民协会、

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他带领妇女积极参加争取婚姻自由、反对蓄婢纳妾的斗争，组织工、农、商、渔、学等各界人士举行革命大游行。

江刺横还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他利用国民党北海市党部例会与公共演讲，宣讲新三民主义、共产党的主张以及“非实行革命无以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

“倒陈”运动曾轰动北海，这是北海党组织领导下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一次大较量。江刺横十分憎恨帝国主义在北海的野蛮和残暴，他率领各界民众到外国机构驻地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等口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引起了土豪劣绅、封建遗老遗少的恐慌，他们联名告到北海市政筹备处。早就劣迹昭著、欺压百姓的筹备处专员陈椿熙命令警察局逮捕了4名工人纠察队队员。

这让江刺横决定发动“倒陈”运动，他撰写文告、画漫画、编戏剧、写檄文，揭露陈椿熙的罪行。同时，通过北海市总工会发动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发动全市各界群众1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撤销陈椿熙的市政专员职务。

陈椿熙仓皇逃到驻北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部寻求庇护，江刺横获此消息后，指挥游行队伍围住第十一师师部，义愤填膺的群众怒斥陈椿熙，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陈椿熙”“取消苛捐杂税”“立即释放工纠队员”等口号。经过多次交涉，该师代师长邓世增被迫接受群众的要求，陈椿熙终于倒台，持续1个多月的“倒陈”运动取得胜利。

身临险境，他宁死不屈

人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和封建官僚的根本利益，引起反革命阵营的极大恐慌。1927年2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开始对共产党人进行甄别，改组各市、县党部。3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指派曾广钰、李玉岗、林培等人到北海，成立国民党北海市改组委员会，撤销国民党北海市党部中的共产党员、工人运动积极分子、青年运动积极分子江刺横、李雄飞、潘国鼎、潘铁汉、冯慕周等的职务。

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广东南路地区党组织的一批领导者遭到捕杀，驻北海的第十一师也在频繁地调兵遣将，派遣奸细四处刺探共产党的活动情况。

面对剧变的形势，江刺横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应变措施，决定绑架并软禁邓世增，迫使其军队交出武器。同时，策反驻军一连，并由工会布置秘密赶制大刀等武器，准备实行武装暴动。4月17日，广东党组织也做了应变准备，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广东南路特委通知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在5月前赶到广州湾（今湛江市）开会研究行动对策。

但是，正当江刺横准备动身赴广州湾时，国民党当局探知了消息。4月23日，大批国民党军警封锁街道、码头，包围北海市总工会所在地三婆庙、党的秘密联络点肖我照相馆等处，逮捕了江刺横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骨干。

敌人对江刺横严加审讯，妄图获取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暴动的情报，以一举消灭南路的武装力量。北海审判厅厅长江磷如是江刺横的堂兄弟，他听从邓世增的命令，以亲情的名义多次对江刺横劝降，并以高官厚禄、出国留学作为诱饵诱惑江刺横。江刺横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揭露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的罪行，以及江磷如、邓世增等人祸国殃民的凶残本性。

敌人见状，对江刺横施以酷刑，但江刺横宁死不屈，他从容地给党写了一封绝笔信，信中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愿将碧血溅黄花……为党捐躯，为民献身，死而无愧。虎狼未除，民不安生，难以成眠。愿同志齐奋起，革命得胜，死者欢欣！”他还给妻子留下一封遗书，劝慰妻子：“死后有知，梦慰吾妻，佑保我儿，魂不分离。”

北海的革命群众得知江刺横被捕后，异常愤慨，准备营救。敌人生怕群众劫法场，在5月3日这天佯装在西炮台布置刑场，暗地却将江刺横等7人押到牛车沟行刑。年仅27岁的江刺横英勇就义，献身革命。

(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二、钟竹筠：广东南路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钟竹筠(1903-1929)，广东遂溪人，北海早期女伶工会组织者。1921年秋，她从安铺来到北海贞德女子学校学习，在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6年初，任中共南路特委妇女部部长。1927年1月，任中共防城东兴支部书记。同年9月，在东兴被捕，后被押到北海囚禁。1929年5月31日，在北海西炮台英勇就义（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供图）

钟竹筠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短暂的生命却在北海这片土地上绽放出夺目的光芒。

1929年7月31日上午10时，凄厉的军号声在北海的上空回响，令人心颤。从北海市审判厅（今广东北路和茶亭路交会处）往西炮台的路上，沿途设有许多岗哨，国民党军警荷枪实弹，戒备森严，行刑队簇拥着一辆黄包车，沿途行驶。黄包车上坐着的戴着脚镣手铐的人正是钟竹筠——广东南路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南路地区妇女运动的先驱。

慷慨赴死的路上，孱弱的钟竹筠还向两旁围观的群众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鼓励人们为革命理想而继续斗争。

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

钟竹筠，原名钟秀贞，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18岁时，钟竹筠从安铺来到北海贞德女子学校读书，由此点燃了北海妇女解放运动的星火，她是北海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钟竹筠家境贫苦，8岁那年遂溪遇上大灾荒，为寻找活路，父亲带着两个哥哥，母亲带着她分

头外出逃荒，后到廉江县安铺镇谋生。10岁那年，她进入安铺小学就读。钟竹筠聪慧伶俐、勤奋好学，深得邻里和亲友的喜爱，但因家境贫困，不久后被迫辍学。1921年秋，得到在北海经商的姑妈资助，钟竹筠转到北海贞德女子学校就读。钟竹筠尊师爱友，乐于助人，对人总是热情有礼，常常帮助年纪小的同学梳头、洗衣服，有时还到厨房帮忙挑水洗菜。同学们亲切地称呼她为“秀贞姐”。

在此期间，进步青年韩盈（遂溪人，在广州铁路工程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南路地区最早的革命领导人之一）多次来北海贞德女子学校探望钟竹筠，带来许多革命书籍和进步书刊。钟竹筠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思想在心中萌芽，也逐渐意识到妇女独立和解放的重要性。

钟竹筠常常在进步学生中传阅、散发革命书刊，给同学劳瑞梅、李玉霞等讲解《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还带头剪掉长辫留短发，以实际行动积极号召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政治斗争。她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启发同学，如“男女不应当平等？”“重男轻女，妇女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公平吗？”“三从四德对吗？”等。同学们都觉得很新鲜，议论纷纷，却答不出来。于是，她给同学们讲革命道理，讲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妇女解放的道理，引发一场又一场思辨，由此孕育了革命的种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北海的传播。

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莽莽神州风云滚滚，钟竹筠和万千爱国青年一样，立志救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在斗争中成长。

1925年春，钟竹筠离开学校后，在广州湾、雷州半岛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妇女进行反封建斗争。她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包办婚姻，成为广州湾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在此期间，她结识了广东省农民运动领袖之一、南路党的负责人黄学增。4月，经黄学增介绍，她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第四期学习。

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钟竹筠认识了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革命先驱，深受其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南路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在革命工作中，钟竹筠与韩盈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两人不久后便结成了革命伴侣。

点燃向封建礼教开战的烈火

1925年9月初，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根据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的有关规定，钟竹筠加入了国民党并争取在国民党的中心部位开展工作。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组成南路特别委员会，钟竹筠被任命为广东南路特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负责指导南路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

1925年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南征，讨伐盘踞南路的反动军阀邓本殷，钟竹筠随军南下。所到之处，她发动农民和妇女进行反封建斗争，打击土豪劣绅，分田分地，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为非作歹的外国神甫，把天主教堂开办的教会学校改为遂城女子小学。她为妇女上课，带头编演倡导婚姻自由的话剧，号召当地妇女团结起来向封建礼教开战，和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作斗争，学习文化、关心革命、走向社会，争取人身自由和政治解放。

那时一些为生活所迫或其他原因沦为娼妓的妇女，受尽折磨和剥削，处境很悲惨。钟竹筠利用组织起来的妇女力量，同凌辱、虐待妇女的鸨母作斗争，并组织了女伶工会，让她们在北海市

总工会的领导下，接受教育，起来抗争。先后有 10 多名妇女在她的帮助下跳出火坑，钟竹筠给这些妇女戴大红花，引导她们走向新生活。这些脱离苦海的妇女对钟竹筠非常感激，在钟竹筠被捕入狱的 1 年多时间里，她们曾冒着风险，赶到北海给她送钱送物。

1926 年，广东南路地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组织决定派遣钟竹筠到中越边境防城县开展建党工作。钟竹筠毅然将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儿子交给嫂嫂抚养，离开疾病缠身的丈夫，只身来到东兴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并到北海、合浦指导妇女工作。在她的指导下，当地的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都得到了加强和发展，一大批女教师和女学生纷纷加入妇协会，成为骨干力量，钟竹筠也被选为东兴妇女解放协会主席。

1927 年，钟竹筠主持建立中共防城县第一个支部——东兴支部，她任支部书记；同时，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并介绍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广州学习。凡是钟竹筠工作过的地方，群众的革命士气都得到极大的鼓舞，妇女解放运动像烈火般熊熊燃烧。

以生命捍卫共产党人的信仰

钟竹筠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很大恐慌，加之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城乡陷入白色恐怖，大批党员和革命者遭到杀害，尤其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更是国民党反动派“清党运动”的主要对象。

4 月下旬，钟竹筠的丈夫韩盈在遂溪被捕后惨遭杀害；5 月初中共北海支部负责人江刺横等 7 人也在北海被捕后牺牲。9 月，国民党东兴警察分局局长沈石夫接到钦廉“清党委员会”逮捕钟竹筠的密令，但惧于钟竹筠在群众中的威望，不敢公然下手，便决定暗中逮捕。一天晚上，沈石夫谎称请钟竹筠去“议事”，随即将她秘密羁押，并用船连夜解送到北海。敌人视她为共产党要犯，先拘押在国民党北海警察局（今海城区第二小学所在地），后又关在审判厅。在狱中，钟竹筠从敌人口中知悉自己的丈夫、战友韩盈英勇牺牲的消息，悲痛欲绝，也更加憎恨国民党反动派，坚定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国民党北海当局反动头子廖国彦于 1927 年 11 月 9 日在向上级邀功的《拘获共逆钟竹筠一名的情由》的呈报书中说：“……计抄开通缉人黄学增等 50 名籍贯一册，奉此，查册内钟竹筠一名，向在防城、东兴办理妇女解放协会，本年 9 月经钦廉清党委员会电飭防城清党委员会拘解来此……当由职处代为收押，现尚押在处……呈请查核批示……”

敌人多次软硬兼施对钟竹筠进行刑讯逼供，妄图让她供出党组织的秘密和其他共产党员的姓名，钟竹筠都斩钉截铁地回绝。

国民党审判长见钟竹筠年轻貌美，无耻地提出要娶她为妾，许她富贵生活，让她脱离共产党，被钟竹筠严词斥责。

钟竹筠被监禁了 20 个月，在最后一次审讯中，审判长还不死心，卑鄙地对她说：“竹筠啊，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所理想的革命不是完了吗？你的先生也被枪毙了！你是个有知识的妇女，年轻又有才学，只要你答应脱离共产党，说出共产党的秘密，和我结合，金钱、地位都有……”

钟竹筠正义凛然地厉声打断：“革命不会完！最终完的是你们这伙人面兽心的反动派！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

钟竹筠受尽敌人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以如磐的意志践行了入党时的铮铮誓

言，保持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临刑那天，钟竹筠向敌人严正声明：“我要坐车，要向群众告别。”敌人慑于她的浩然正气，又因她的身体已被折磨得几乎走不动了，不得不让她坐车赴刑场。车至刑场，下车时她镇定自若，昂首挺胸，面无惧色，双眼眺望着祖国多难的大地，坚定地走向西炮台刑场。

钟竹筠以她 26 岁的年轻生命，捍卫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与信仰。

(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三、赵世尧：还我英雄本色——在北海的革命活动追记



赵世尧(1917-1970)，北海市人，北海早期工人运动组织北海工人抗敌同志会成立的推动者。1937年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44年，先后任中共合浦县工委武工部部长兼北海党支部书记，中共南路特别支部、中共合浦县工委书记，中共南路特委委员兼茂名特支书记，人民解放军某支队一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1970年去世（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供图）

赵世尧，北海党组织重建领导人，于1917年出生在北海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排行第二，俗称赵二。走上革命道路后，人们都尊称他为赵二哥。

赵世尧7岁进入北海香坪小学接受启蒙教育。1929年2月，他小学尚未毕业，便考入合浦一中初中春季班学习。在校的3年间，虽说他年纪尚幼，但已显示出对进步活动的兴趣。当时，共产党员杜君恕、杜君慧两姐妹，进步教师彭迪芬、冯道先等先后在合浦一中任教，传播革命思想，这对赵世尧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追求人生的真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深，面对这黑暗、混乱的时代和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赵世尧愤然而起，与同学苏觉民、黄铸夫等组织北海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发起抵制和查缉日货的行动。北海旷日持久的抗日救国运动由此揭开序幕。1932年春，初中毕业后，赵世尧赴广州求学，并购买了一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自学，颇受裨益。同年秋，他因母亲生病转返北海。

1933年春，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入侵中国，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难当头，为了更好地挑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北海的热血青年迫切要求学习革命理论，接受和传播进步思想。在此情况下，赵世尧与冯廉先、黄铸夫、王文昆等秘密组织了“未名”读书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进步政治书刊。“未名”是“未明”的谐音，取“长夜漫漫何时旦，我们需要战斗到明天”之意。该读书

会还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出版发行联络机关取得联系，曾多次接收过该机关以“上海复旦大学×××号信箱赵文卿”名义伪装寄来的各种邮件，其中有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毛泽东的著作和革命烈士的传记等。他们除了秘密学习讨论进步书刊，还多次趁夜秘密将《红军捷报》等中共中央宣传品张贴和散发于北海街头，宣传红军胜利的消息，这对北海民众的影响很大，也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关注，反动政权曾予以调查，但毫无所获。

1933年秋，赵世尧再度前往广州求学，因觉得学校不理想，于同年10月转学返回合浦一中高中部就读。赵世尧返回北海后，鉴于当时合浦一中内进步与反进步两种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他认为以往的小团体活动已不大适应全校性斗争的需要，于是积极参与全校性的活动。此时，恰逢学生会改选，经全校各班代表会议共同推选，由赵世尧、苏觉民、罗绍周担任学生会的常务理事，主持学生会工作。

赵世尧担任学生会常务理事后，便住在学生会里。为了表达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他剪了一张列宁小时候的照片，公然张贴在学生会的墙上并署名“伊里奇”，此举颇令进步学生钦佩。

学生会改组后，出版了一种铅印的刊物，取名《缪丝》，内容主要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抗日救国及倡导新文艺。赵世尧曾写过若干理论文章并刊出，还在进步教师石端的帮助下翻译了一篇《列宁辩证法》的文章，为避嫌疑，改名为《新哲学》发表。此外，赵世尧还十分重视读书会的工作。他以“未名”读书会的骨干为核心，积极发动全校各班组织进步的读书会，以此团结一大批进步学生。这样，就在学校内形成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进步力量，其中由庞自、吴世光、陈广才、林施均、卢传义等在何醒予家组织的“静励斋”读书会影响最大，他们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开展各种进步活动。

此后，当广东军阀陈济棠企图以提倡读四书五经和加重功课负担为手段，禁止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时，赵世尧通过学生会发动中学生静坐“怠课”、考试交“白卷”，以此反对这种复古读经和压制学生的措施。1935年前后，赵世尧、冯廉先、黄万吉、张文纲等还利用寒暑假在北海举办了学习班。学习班以上海“语联”（“左联”下属组织）提出的“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作口号，宣传和推行党的新文化和进步思想。参加学习的有五六十名北海青年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

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得到了北海人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赵世尧、苏觉民等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组织合浦一中学生，联合北海各小学教员近千人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并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声援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后，北海的抗日救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36年初，杜渐蓬等率领中山大学学生返乡抗日救国宣传队回到合浦、北海，积极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赵世尧等加强了对合浦一中学生运动的领导，组织宣传队到灵山、石康、南康、公馆等圩镇、农村进行宣传，使广大民众的思想进一步觉醒。此时，何世权（李英敏）已到合浦一中任职员，他与赵世尧联合倡导读书活动。过去在少数先进学生中的秘密读书活动，此时已发展为众多学生公开读进步书刊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青年学生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为以后党组织的重建进一步打下了思想、理论基础。

这一时期，通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以及积极投身和领导北海的进步学生运动和抗日救国运动，赵世尧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并逐步趋向成熟，其追求真理、追求革命的信心也更加坚定。正是通过这些活动，赵世尧以其敏锐的思想、过人的学识以及极强的组织能力等特点，赢得了进步同学的尊重和拥戴，他在学生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生领袖。

投身火热的斗争

1936年8月，赵世尧高中毕业。此时，恰逢在“两广事变”中新恢复的第十九路军进驻廉州、北海。对第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倾向，赵世尧早有所闻，当该部政工队在第六十师师长翁照垣的秘书张梅生的带领下先期到达北海时，赵世尧即与之取得联系。通过与张梅生的接触，赵世尧、冯廉先等认为第十九路军是比较坚决抗日的，便决定积极发动北海各界民众支持第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

第十九路军正式进驻北海时，在张梅生、赵世尧的指导下，由北海的一批先进青年学生去发动组织工人、渔民、市民和学校师生数千人会合于中山公园，召开了北海各界民众欢迎抗日爱国将领翁照垣暨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大会声势浩大，军民团结抗日气氛浓烈，对北海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稍后，第十九路军政工人员通过在北海民众中秘密调查，认定丸一药房的老板——日本人中野顺三有间谍行为，遂由翁照垣指定张梅生组织人员刺杀中野顺三。张梅生经过周密的谋划，挑选了7名大汉组成一个便衣队，具体执行刺杀任务，并于9月3日下午7时左右将中野顺三杀死，史称“北海事件”。群众议论纷纷，认为中野顺三死有余辜。之后，张梅生到合浦一中与赵世尧等商谈，决定筹备成立北海学生抗日救国会及北海民众抗日救国会。后来，当国民党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公署秘书凌士芬奉蒋介石之命前来北海调查时，赵世尧以“北海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在中山公园召开了北海各界民众对蒋介石政府亲日卖国外交政策动员大会，发动全市学生、码头工人、驳艇工人和各界市民数千人到海关码头抗议凌士芬到北海调查。赵世尧还作为北海市民代表参加了谈判，他慷慨陈词指斥凌士芬：日军在东北、上海大量屠杀我同胞，你们应该到那里调查而不应该到北海来，中野顺三是一个日本间谍，死有余辜。他还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退南下三师，北上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北海民众强烈的反蒋抗日情绪使凌士芬甚为震惊，当日即狼狈离开北海。

9月下旬，形势剧变，日本7艘军舰到北海口岸炫耀武力。面对日军军舰压境进行武装威胁的严峻形势，北海进步青年学生尤为激愤，纷纷紧急动员，要求第十九路军发给他们枪械，以实行武装保卫北海。但由于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已向蒋介石妥协，第十九路军翁照垣等将领虽有抗日救国之志，但迫于蒋桂政权的压力，还是紧急撤离北海。在此情势下，经过商议，冯廉先、王文昆等进步青年投笔从戎，进入翁照垣部政工队工作，赵世尧仍留在北海。

至此，轰轰烈烈的以“北海事件”为中心的北海抗日救国运动告一段落。这次运动对赵世尧的思想震动极大。当第十九路军到来，抗日救国运动迅猛兴起时，赵世尧是欣喜若狂的，以为革命已经来临，随即便全身心投入运动中。也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他的组织能力、领导才干得以充分显示。在他和张梅生的领导下，在一批青年学生骨干的努力下，北海的民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这使他更为振奋，也深切感受到组织起来的民众力量的伟大。然而，仅1个月左右，事件的急转直下、运动的迅速冷落又使他感到迷惘和失望。正是在这失望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即不能将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旧军队的几位爱国将领身上，也不能寄托于自发的几起激烈的行动，要革命，就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这是至关重要的。于是，1936年9月下旬，他毅然决定再次赴广州寻找党组织。10月，他在广州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历程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

唤起家乡的民众

1937年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赵世尧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此刻，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呼吸着故乡带有海腥味的空气，他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这次，他是受中共广东省委的直接派遣，返回家乡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独当一面去开创一个地区的革命工作，难度是很大的，是需要勇气和经验的，而赵世尧还那么年轻，21岁的他能承担起这繁重艰巨的任务吗？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赵世尧，坚信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只要自己能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一定能唤起家乡的父老兄弟共同投身革命。

家乡人民以空前的热忱欢迎赵世尧。母校合浦一中聘请他任图书馆主任，一大批有爱国思想、有理论修养的进步青年学生迅即聚拢在他周围。返回北海的赵世尧如鱼得水，很快便在这批先进分子中物色了一些建党对象。经过慎重考察和积极的教育培养后，1938年2月，赵世尧首先发展合浦一中学生庞文雋（庞自）、郭李晃（郭芳）、谢祖估（谢王岗）、利培源和社会青年王文昆等入党，并分别组建了合浦一中、北海镇和西场的党小组，这些党小组均由赵世尧负责联系领导。至此，北海的党组织自1926年建立，1927年被破坏，中断11年之久后终于重新建立，这是北海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创了北海革命斗争的新纪元。

1938年2月，张进煊受中共广东省委的派遣，返回合浦开展发展党组织的工作，并奉命与赵世尧联系，与他共同战斗。同月，张进煊分别在廉州中学、廉州镇、公馆、白沙等地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小组，由张进煊、何世权负责联系领导。

4月，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成立，张进煊担任书记，赵世尧、何世权为委员，分别负责北海、廉州的工作。此后，北海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至是年底，北海的党员已发展至近百人，成为北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和中坚力量。

在积极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赵世尧还注意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团结北海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工作。3月，在党组织的布置和推动下，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宣告成立。抗敌后援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担任常委和委员的有北海各界知名人士及国民党军政要员，但他们大多只是挂一个虚衔，负责实际组织领导工作的是总干事赵世尧。

北海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下设宣传、组织、调查、募捐、防护各组，从事各项抗日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此外，后援会还于1938年4月推动各界分别成立了工人抗敌同志会、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等组织。赵世尧利用其担任后援会总干事之职，有意识地安排一批党员参加后援会，并负责具体工作，如罗刚、王文昆、李梓明、何醒予、张书坚等分别任工人抗敌同志会、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的负责人。这样，后援会实际上便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党组织正是通过抗敌后援会这一机构，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有效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当时的北海，抗日气氛分外高涨，工、农、商、学、兵都动员起来了，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这

一伟大的洪流中。每天凌晨，由工人抗敌同志会、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和合浦一中学生组成的晨呼队便遍布北海的大街小巷，高呼“打倒日本鬼子除汉奸”等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此外，北海的主要街口均张挂巨幅宣传画，其中一幅画了一条大蚕虫正在不停地吞吃一片桑叶，形象地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蚕食”我国的罪行揭露出来，大大地激发了民众的义愤。

为适应抗日救亡新形势的需要，北海党组织在北海女子小学举办了为期1个月的抗日救亡工作干部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各抗日团体负责人及骨干分子五六十人，由赵世尧担任主讲，讲授内容有时事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救亡宣传和组织工作艺术以及革命政治理论等。这个学习班为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培训了一批有理论基础、有工作能力的干部。此后，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38年7、8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广州中山大学抽调陈任生、韩瑶初、张世聪等一批党员返回合浦工作，其中陈任生、韩瑶初参加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的领导工作，赵世尧仍为特支委员。随后，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领导了反对反动分子叶天一出任合浦一中校长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在张进煊、赵世尧的直接领导与部署下进行的。当时，合浦县当局已委任叶天一为合浦一中校长，此人曾在公馆五中当校长，一向反对学生读进步书刊，阻挠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大肆散布反共言论，早已声名狼藉。针对这种情况，张进煊、赵世尧与合浦一中党支部商议后，决定抵制叶天一出任合浦一中校长，并发动合浦一中、廉州中学学生一起向合浦县当局请愿，鲜明地提出反对奴化教育、实施抗战教育等要求，还通过做社会上层人士的工作，大造舆论，对合浦县当局施加压力。在此情况下，合浦县当局被迫将叶天一撤走，“倒叶”斗争取得了胜利，共产党进一步占领了合浦一中阵地。

11月，中共广东省委派周楠来合浦，在北海朝阳里桂园召开中共合浦县特别支部扩大会议，决定按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建立合浦工委以加强党对这一地区的领导。赵世尧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合浦县工委委员，主管统战群众工作及北海党组织的领导工作。此时，由于广州沦陷后形势日趋紧张，合浦县工委为了开辟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积极推动廉州中学和合浦一中迁至小江等地。两校迁址后，大批党员骨干随之转移，在小江附近农村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赵世尧奉合浦县工委之命，留守北海，继续领导北海人民进行斗争。

1939年2月，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派李士洋返回合浦建立中共合浦中心县委，赵世尧仍当选为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委员。3月，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决定筹备召开合浦县青年代表大会，抽调张进煊、赵世尧主持筹备工作。筹备期间，因闻知合浦地方势力邓世增等反对开这次大会，张进煊、赵世尧便主张请第一七五师政治部主任林增华主持这次大会，以此抵制邓世增的反对。经中共合浦中心县委同意，张进煊、赵世尧便到合浦东坡公园（第一七五师政治部驻地）找林增华，要求其予以支持，并邀其任大会名誉主席。林增华欣然应允，还提议邀请邓世增同为大会名誉主席，迫使其同意召开大会。同月，由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倡议，第一七五师政治部出面主持的合浦县抗日青年代表大会如期在张黄召开，到会代表数百人，均为合浦各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团体中的骨干分子。中共合浦中心县委领导成员张进煊、赵世尧等参加了大会，还秘密组成大会的党团组织，下进煊任书记，赵世尧负责领导、布置大会工作。国民党合浦县党政军的负责人也出席了大会，

林增华、邓世增等还在会上作了讲话。赵世尧、王文昆、罗永莹等代表合浦青年在会上发言，利用大会讲坛大张旗鼓地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力。大会历时数天，最后通过了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决议。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抗日的大会，是党领导下的进步青年运动的一次大检阅。但是，这次大会亦是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暴露，国民党八区专员邓世增事后对合浦青年运动发展的迅速和力量的庞大很是震惊，认为如不是有共产党领导，绝不可能。

这次大会以后，合浦、北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而赵世尧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党的组织者的才干，展示了他作为群众运动领袖的威望。

(作者：易海。原载《中共北海党史文摘》，有改动)

四、钟辉廉：北海早期工人运动先烈

钟辉廉（1898-1927），北海人，原名钟英，其父钟兰舫以教书为业，开有一间私塾。他教学严谨，在北海颇有名气。钟辉廉的母亲开了一间杂货店做小生意，生活比较富裕。钟辉廉既受父亲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又受母亲勤劳朴实、机灵应变的性格熏陶，从小就形成了敢闯的个性。

钟辉廉敢闯的个性使其父钟兰舫伤透脑筋。钟辉廉成年时，敢闯的个性更加突出了。他目睹帝国主义在北海设领事馆，篡夺海关、税收、邮政、盐务主权，开洋行，设医院，建教堂，进行野蛮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买办相互勾结，残酷剥削压迫北海人民，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榜样，决心去干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但是，严厉的父亲却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去“闯世界”。为了让儿子“安分守己”，钟辉廉21岁时，父亲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门面，要他以车衣为业，以此束缚他。而钟辉廉却利用独居的有利条件，更大胆地走向社会，更广泛地接触工人、店员、船民等平民阶层。由此，他认识了许多工人朋友，他向工友讲述了辛亥革命后的全国局势，教育工友们团结一致，同剥削阶级作斗争。他还用平时节约的钱救济一些生活困难的工友，成了工友们的朋友，深受工友们爱戴和支持。

1925年8月，省港罢工委员会派工人纠察队来到北海，组织工人、学生进行反帝爱国运动，封锁北海港，禁止英帝国主义轮船入境，搜查英货，进行罢工、罢课、罢市。钟辉廉积极投入了这场伟大的罢工运动。

1926年5月，中共广东南路党组织派党员江刺横等到北海市秘密建党。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江刺横利用重新筹建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机会，深入工人、店员、船民中去，秘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钟辉廉请江刺横到他父亲开办的私塾课堂向群众演讲、教唱革命歌曲等。在钟辉廉的大力协助下，北海市第一个基层工会——车缝工会成立，钟辉廉任工会负责人。在车缝工会的带动下，海员工会、码头工会、建筑工会、手车工会、理发工会、五金工会等10多个行业工会相继成立，会员达5000余人。在中共北海支部的领导下，北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1926年10月，北海市总工会成立，钟辉廉任工会委员长。在北海市总工会的组织领导下，平民夜校、工人俱乐部、工人纠察队、工人讲习班纷纷成立。钟辉廉除了讲授课程，还组织学员到市郊石子岭一带宣传发动农民群众，号召农民与工人团结起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军阀，破除封建迷信，反对蓄婢纳妾，捣毁菩萨神像，把庙宇改为学校，并将三婆庙作为北海市总工会的办

公地点。在江刺横、钟辉廉的领导下，北海的工人运动成为广东南路规模最大、最有成绩的运动之一。1926年底，钟辉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初，北海市总工会组织发动工人群众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陈”运动。陈椿熙原为北海市警察局局长，后升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他利用职权溢收税润、贪污勒索，引起极大民愤。北海市总工会决定开展“倒陈”运动，并成立了北海市各界打倒陈椿熙委员会，向全省发出声讨陈椿熙的“快邮代电”檄文，罗列陈椿熙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10条罪状，并发动各界罢工、罢课、罢市，举行万人游行示威。钟辉廉手执红旗走在示威队伍最前列，带头呼喊口号：“陈椿熙不打倒，决不复工！”陈椿熙最终被迫下台。这是北海人民在北海市总工会成立后，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开展斗争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1927年2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发出“改组全省各市县党部的决定”；3月，在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内任职的共产党员江刺横（组织部部长）、简毅（工人部部长），国民党左派张达超（妇女部部长）等被解除职务，另由国民党右派曾广钰等5人组成市党部。这一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动，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右派的狰狞面目。钟辉廉领导北海市总工会果断采取措施，四处张贴“打倒新兴军阀”等标语，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右派，揭露敌人破坏革命的罪恶阴谋。江刺横、钟辉廉在白屋村秘密召开工人骨干会议，准备组织工人武装起义，但由于坏人告密被敌人袭击而失败。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北海工人运动受到严重破坏。钟辉廉不顾个人安危，继续领导工人开展秘密斗争，他组织发动基层工会制造600余把大刀，准备反击国民党的残酷镇压。

1927年4月23日深夜，驻北海的国民党第十一师突然包围北海市总工会以及党的秘密联络机关肖我照相馆等处，江刺横、钟辉廉等10余人不幸被捕。

钟辉廉被捕后，国民党右派分子曾动员钟兰舫去劝说儿子“痛改前非”，但钟辉廉义无反顾，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利诱，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祸国殃民的罪行。他在狱中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位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意志。1927年5月3日，钟辉廉与江刺横等7人在北海市东海滩被国民党杀害，时年29岁。

（北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五、张达超：在大革命洪流中熠熠生辉

张达超，女，生于1908年，祖籍广西博白县龙潭乡，民国初年定居北海，其祖父在香港、广州、海口等处开有杂货店。

1913年至1925年是张达超求学时期，也是其家庭兴盛时期。作为祖父钟爱的长孙女，她在北海贞德女子学校读至小学毕业，后转至香港、广州等地的教会女子中学（学院）继续求学。那时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及其后的省港大罢工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广州成为全国革命运动中心之一。求学时期的张达超在香港、广州等地，比蜗居家乡小城能接触更多的社会现象，认识世界。耳闻目睹无数仁人志士轰轰烈烈的革命壮举，张达超开阔了视野，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张达超所念的都是英国教会办的学校，因此她对殖民主义的虚伪和凶残有了极为深入的认识。1925年夏天，在伸张民族正义的罢工浪潮冲击下，她所在的广州圣希理达女子学校关门了，只读了两年的她匆

匆结束学业，却没有丝毫的彷徨，而是立即回到家乡北海，投身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的革命事业。

1925年冬，国民革命军南征讨伐军阀邓本殷。在师长陈铭枢的率领下，第十师打败了邓本殷，掌控廉北大地，随后进驻北海。张达超与第十师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李任予、王竞云等建立了革命友谊，同时，与国民党北海市党部负责人江刺横、简毅、李雄飞等共产党员也建立了密切关系，在他们的启迪和帮助下，张达超于1926年春成为国民党左派人士，并出任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当时的她年仅18岁，是唯一进入市党部的女性，也是最年轻的执行委员，却挑起了领导北海妇女解放运动的重担，担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北海分会主任。

1925年秋，张达超刚回到北海，便把广州等地的革命思想向北海传播，教贞德女子学校的学生唱革命歌曲，还组织带领学生到合浦等处演革命小戏。她曾在贞德女子学校读过，深知这所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本质，也很清楚学校监督董恩典奸诈凶残的为人。当时她的几个妹妹达经、达銜、达璐以及好友沈卓青、罗道诚、张德恩等都在贞德女子学校读书，她便给她们讲革命道理，把她们组织起来，带领她们同反动学监做斗争，组织罢课、游行示威行动。在第十师强大武装力量的支持下，董恩典、“卑路鬼”等外国侵略势力的代表人物被驱逐出境，贞德女子学校这所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停办。贞德女子学校停办后，该校学生失学，社会上还有不少其他学校的失学青少年。在这种情势下，张达超取得市党部和第十师的支持，并得到家里的同意，果敢地自办超光女子小学，自任校长，把原贞德女子学校的学生及其他失学青少年接过来免费施教。她除了授课，还把自己的启蒙教师、弟弟等请来义务授课。她租了东一巷口附近的几间民房作为教室，房租、桌椅、教材等都是她来解决，学生不用花一文钱。有了这所自办学校，学生不用再受气，张达超感到非常自豪，她的祖父也为自己有个才18岁就当校长的孙女而骄傲，所以舍得掏钱供她办学。

1926年6月上旬，第十师奉命开拔参加北伐战争，接防的是邓世增代师长所率的第十一师，其政治倾向与第十师不同，对北海革命力量持不公开的反对态度，而支持以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势力，对革命运动实行排斥与打击。1926年下半年起，北海的革命运动遭遇挫折，超光女子小学在政府的阻挠下只办了2个月便被迫停办，张达超所在的妇女解放协会也遭到打击。

张达超为了妇女翻身解放，先是动员妇女剪辫子、放足，反对束胸，接着在全市开展反对蓄婢纳妾运动，把广大妇女从封建夫权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为了教育青少年学生，她组织女学生登门实地调查北海蓄婢纳妾的情况。有一次，她带队到东一巷附近一个富户家调查，发现那富户的第六房姨太太竟是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虽穿戴得珠光宝气，却稚嫩得很。张达超跟她谈话，她嘻嘻地笑着，很多事都不懂。调查出来之后，学生们感慨地说：“这是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女孩啊！”大家都哭了。张达超积极鼓动这些被压迫凌辱的妇女起来申诉，并为很多被迫卖身为妾的女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使她们脱离了苦海。这一来，连很多地方官吏的小老婆也纷纷提出离婚，闹得很厉害。到妇女解放协会找张达超办理离婚的受害女性越多，向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告状的地方官绅也就越多。为此，陈椿熙曾专程来到张达超家（茂和商店），对她父亲说：“你女儿自己还未结婚却要管人家的离婚事，闹得太不像话了！你不好好管教子女，日后出什么事我可保不了她！”因此之故，超光女子小学很快便在地方政府的压力下解散了，父亲与祖父虽然也怕女儿出事，却又无法把她锁在家里。张达超也明白以后的斗争环境更加险恶了。

张达超还组织安排一些进步青年到广州求学，学习革命本领。如她一个亲戚的女儿罗道诚，年纪轻轻便表现得有胆有识，张达超便将其介绍到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其学习结业后留在了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当文书：张达超还介绍张家养女沈卓青到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当勤务。

1926年8月，省港大罢工已坚持了14个月，为了表达北海各界妇女对罢工运动的支持，张达超代表北海各界妇女来到广州，与已在广州学习的罗道诚一起到罢工委员会递交北海妇女解放协会对罢工工人的慰问信。

1926年11月，北海革命形势变得严峻，北海市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盘剥、压榨人民越来越肆无忌惮，在中共北海市委负责人江刺横等同志的领导下，北海人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倒陈”运动，编印散发“陈椿熙十大罪状书”，以“快邮代电”的方式传播全省，其中就有“解散超光女子小学”及“包庇纵容蓄婢纳妾”等内容。“倒陈”运动体现出非常高的斗争艺术，先是在11月18日成立北海市各界筹备农工商学联合会，召开了计有31个社会团体参与的万人大会，张达超作为妇女代表入选大会5人主席团。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有一条就是“撤办市政筹备处专员陈椿熙”。会后举行万人示威大游行，人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陈椿熙！”“人民有选举罢免权！”等口号。但陈椿熙得到了第十一师代师长邓世增的庇护，仍有恃无恐地派出警兵四处拘捕市民，连出面调停的群众团体代表也遭到拘捕和殴打，这更激起了北海市民的愤怒。在江刺横等人的领导下，12月18日，北海发起了罢市行动，商店关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全市陷入瘫痪。陈椿熙被吓破了胆，跑到第十一师师部寻求邓世增的庇护，不敢露面。邓世增出面假惺惺地与市民代表谈判，但他假谈判真包庇的嘴脸被群众代表揭露无遗，最后迫于全市民众的强大压力，陈椿熙被撤掉职务。

“倒陈”运动的胜利，使第十一师更加深了对国民党北海市党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仇恨。在风声越来越紧的情况下，为培养和保存革命力量，1926年12月末，国民党北海市党部决定委派张达超为市党部代表出席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张达超又来到了广州。会议结束后，她征得市党部的同意，留在广州并加入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协助区梦觉主任继续从事妇女解放运动。1927年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北海方面的通缉令对张达超的威胁并不大，加之她来广州不久，且只在妇女解放协会工作，并不知名，且她只是国民党左派，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能侥幸逃脱。

大革命失败后很长一段时间，张达超失去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她的上级和战友有些牺牲了，有些被捕了，有些失踪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仍为革命事业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她视同姐妹的沈卓青1927年在广州加入共产党，并任广东省委秘密交通员，1930年在广州不幸被捕，她曾设法营救，但未及行动，敌人便先下手，沈卓青光荣牺牲，这是令张达超终生悲痛的事。张达超的4个妹妹，在她的影响和鼓励下，都冲出家庭的樊篱，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其中较大的3个妹妹1934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小的妹妹后来也在新四军中入了党，这是令张达超稍感欣慰的事。

张达超在大革命失败后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路，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参加工作，均兢兢业业，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她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于1970年在上海去世。在张达超62年的生命历程中，1925年至1927年是她最闪耀的年华，上面记述的便是她这两年活动的梗概。

（作者：张九皋。原载《中共北海党史文摘》，有改动）